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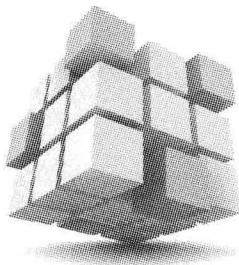
主体现象学：主体的自由之旅

ZHUTI XIANXIANGXUE : ZHUTI DE ZIYOU ZHILU

向达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主体现象学：主体的自由之旅

ZHUTI XIANXIANGXUE.ZHUTI DE ZIYOU ZHILU

向达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主体现象学：主体的自由之旅 / 向达著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620-4701-8

I. ①主… II. ①向… III. ①主体-现象学 IV. ①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5532号

书 名	主体现象学：主体的自由之旅
	ZHUTI XIANXIANGXUE : ZHUTI DE ZIYOU ZHILU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5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邮箱 academic.press@hotmail.com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437(编辑室) 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规 格	720mm × 960mm 16 开本 13.750 印张 225 千字
版 本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0-4701-8/D · 4661
定 价	39.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印刷厂负责退换。

序言：反思与超越

与我的第一本书相比，这本书是“计划生育”，不像第一本书那样是写好了后才取得名字。这是不是喻示着我的成熟呢？我也不知道。为给此书取名字，我在动笔之前颇费了一番功夫。回想起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北航的图书馆里想啊想，有时呆坐一天也一无所获。后来有一天我回到家，无意中看到书架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于是茅塞顿开，何不取名为《主体现象学》？《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的一部纲领性著作，搭建了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框架，其此后的著作基本是在《精神现象学》的框架里展开的。此著中，黑格尔构建了意识之旅的路径，从逻辑到自然哲学再到精神哲学，其间经历了意识的感性和理性、历史和逻辑的漫长旅程。最后定格为精神哲学，黑格尔称其为科学，认为主观和客观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恩格斯说：“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1]可见黑格尔在此的基本思路还是传统的理性主义运思，他相信理性的神话，并企图把哲学变成一门科学，这种思想把非理性因素给抹杀了。所以在黑格尔所建构的主体之旅中，是一路剔除非理性，最后只剩下干巴巴的绝对理性过程。这与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不管从历史角度还是逻辑角度看，黑格尔都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集大成者，理性主义理论在此凝结成了高度抽象和纯粹的哲学体系。

据考证，黑格尔将此著作称为《精神现象学》，冠于“现象学”三字，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即他沿用了朗贝尔特的用语。在德国启蒙运动中，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主体现象学：主体的自由之旅

最早使用“现象学”这个词语的是朗贝尔特（J. H. Lambert 1728 ~ 1777）。在其1764年出版的著作《新工具》中，第四部分为《现象学或关于假象的学说》。在此用法中，现象学仿佛还没有摆脱弗朗西斯·培根“假象”理论的阴影。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要获得真理性的知识，应该排除一切假象的干扰，于是提出“四假象说”，即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在此，表现了弗朗西斯·培根对科学的研究认真态度及对真理的尊重。这种理性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朗贝尔特就是其中的代表。朗贝尔特用《现象学或关于假象的学说》作为书名，似乎有把现象学与假象等同之意。实质而言，现象包括了真相和假象，而学术研究就是剔除假象，提炼真相的过程。黑格尔将其著作取名为《精神现象学》，其用意应该是剔除意识中的假象，提炼其真相，从而臻致绝对知识之境。所以，这里的现象学与胡塞尔似的现象学是有很大差异的。

经过这些思考之后，我灵感忽闪，决定将我即将出生的智识之子取名为《主体现象学：主体的自由之旅》。之所以相较于黑格尔的书名，我的多了一个“主体的自由之旅”的副标题，是因为黑格尔所强调的是理性，而我强调的是自由。在此似乎有点和黑格尔唱反调之嫌，其实只是各自的时代背景不同所造成认识差异而已，在此不应该有严格的是是非非的分判。

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正是理性主义在理论和历史实践方面取得重大胜利时期，文艺复兴、新教运动、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等都是这种胜利的最好阐释。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处在这一系列历史胜利的巅峰时期，所以其著作是从哲学的角度对此前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抽象和总结。这种历史的趋势和理论的惯性是一般人很难摆脱的，或许这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有关。在繁荣的经济景象面前，人们似乎相信理性特别是科学理性就是一个神话，就像中世纪人们笃信上帝那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解，就是事物的发展还处在螺旋式上升期，达到了一定的顶点，它就会在自身内部产生异化，从而否定和扬弃自身，最后再一次踏上上升前进的旅程。自我否定和扬弃过程就是事物的停滞甚至倒退期。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正是理性的上升发展期，所以黑格尔是乘势构建其哲学理论的，并且终成为近代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所以成为命运的宠儿。与黑格尔相比，非理性主义者叔本华则成为历史的弃儿。当年他笃定地在柏林大学与黑格尔争夺听众，败得一塌糊涂，最惨的时候甚至只有两个听众，这

让叔本华十分痛苦，最终以辞职离开柏林大学而告终。所以黑格尔和理性主义时代是具有一体性的，为理性唱赞歌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我为自由唱赞歌是建基于一个相反的历史情势的。

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其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这里黑格尔的辩证法似乎也可用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即理性主义的发展包含着自我否定和扬弃的螺旋式过程。首先，在政治层面，理性的发展虽然收获了宪政法治的文明成果，但当理性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后，它就褪变成了一套僵化的教条，压抑了非理性主义的存在，抹杀了人们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抑制了人们的自由，削弱了人们的快乐感。这就是政治的理性，褪变成了一种理性霸权。理性的这种历史结局，跟资产阶级有很大关系。当年资产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时候，社会地位还很低，后来团结工人和农民等起来反抗教会和封建专制，提出了响亮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这种口号既是革命的目标，也是对其同盟的郑重承诺。但革命成功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社会地位的变化，导致了其政治立场的变化，那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态度的转变，形成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理性被当成了一种统治工具，一套统治程序，将人们定格在僵死的理性机器之上，自由、平等等被霸权的理性肢解了。其次，在科学层面，理性幻化为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漩涡中，人类的一切似乎都要沾染上科学理性的气息。上文所述的黑格尔将意识的最终形式定格为绝对知识，并企图在此基础上将哲学变成一门科学，这是哲学对科学膜拜的典型例证。在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在近现代，哲学又成了科学理性的婢女了。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定格了现代社会的意识面貌，使众多的哲学流派都打上了科学主义的烙印。如实用主义、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本来哲学是一门“爱智之学”，包含了科学和人文的向度，但现在是科学引领着哲学，本末倒置，使理性走向了极端。这种影响还表现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意识物质化、浅表化、直观化、荒诞化。这种无孔不入的理性霸权主义精神，令人恐惧与颤栗。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诞生的智识基础。

理性的化身和载体是主体，所以理性的极端化，实质是主体异化的表现。所以我将自己思考的着眼点放在主体上。

主体是近代以来人们关注的热点，是西方文化中一个带有核心性质的字

主体现象学：主体的自由之旅

眼。因为西方文化大致为一种“理”的文化，与中国的“礼”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的近现代政治法律文明就是这种“理”文化不断演变的结果。这一点，黑格尔有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就是绝对精神的化身，是理性充分演化的结果。这个观点其实是很有些道理的。理性的政治需要理性的主体，所以在西方，很多时候，主体就成了“理”的代名词。或者说，主体是理性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基础。作为主体的人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改造者，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正如以上所述及的原因，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或曰人类过分强调理性，强调理性主体，使主体蜕变成为理性外壳的附庸，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人的异化”，实质是“主体的异化”。我在此为何要用“主体”来代替“人”，是因为主体相对于人而言更是一个近代概念，更能体现近现代的文明特征。因为在传统的思想领域里，特别是近代以前，“人”这个称呼是具有人格和身份含义的概念。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的理性主义革命，至少在形式上将人从身份差异中解放了出来，虽然不够彻底，但是从政治、法律、社会等各个层面已将这个框架搭建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再用“人”这个概念，不足以概括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新特征。

这种新文明虽然彰显了历史的进步，但却导致了“主体的异化”。所以，应该来反思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这段历史。问题的症结无非是像西方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过于强大和外化，导致了主体成为理性霸权的附庸。所以非理性主义大多要解构理性，解构现代性，有的甚至主张以非理性的意志作为世界的本源，如叔本华、尼采等。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解构中心、平面、基础、结构等，力图使世界碎片化，我认为这是走向了极端了。我赞同存在主义的观点，“存在先于本质”，强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张主体间性的建构，力争实现“共在”的和谐世界。

所以与其说这本书是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如说是综合研究，这种综合是抽象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应用之结合。这就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特征。我沿袭了存在主义对主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将视角定格在主体和人类社会幸福的构建。在经历了对主体的概述后（第一编），论述了理性主体的生成（第二编），然后区分了一般主体和非一般主体，对非一般主体进行了分类并分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第三编），最后对霸权主义的理性进行了反思，认为在经历了法律主体、伦理主体、哲学主体、宗教主体后，人类的最终归

序言：反思与超越

宿应该是艺术主体（第四编）。艺术主体是前此主体形式的综合与升华，吸取了各主体形式的优点，避免了其缺点，同时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个体主体和人类主体的最高最完满的存在样式。只要实现了艺术主体，个体和社会必将走向和谐和幸福。当然这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主体问题在当下中国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目前对主体的研究基本尚停留于译介西方著作的层面，因此要对主体进行建设性的研究是很需要学术勇气的，我相信本书有很多地方是不令人满意的，在论证的深度和精细方面都尚存在很多缺陷，但一想到学术的价值除了解决问题，还表现在提出问题——我至少提出了一个主体如何幸福的问题，这使我获得了一些勇气。不足之处，还望方家读者多多包涵，多多批评指正。

湘西向达序于北航
2012年12月22日

目 录

序言：反思与超越	1
----------------	---

第一编 概论

第一章 西方主体三段论	3
一、西方文化伦理学转向：主体的确立	3
二、西方文化认识论的转向：主体的深化	6
三、西方文化的后现代转向：主体的反思	9
第二章 中西方主体之差异	14
一、西方之主体：有	14
二、中国之主体：无	17
三、中国塑造主体之必要性	20

第二编 理性主体的生成

第一章 主体的构成	23
一、身体	24
二、意识	30
第二章 文化	41
一、文化释义	42
二、符号	45

主体现象学：主体的自由之旅

第三章 理性主体的交注	49
-------------------	----

第三编 主体的存在

第一章 存在与本质	59
第二章 作为一般的社会主体的存在	72
一、社会	72
二、作为一般的社会主体的存在	78
第三章 作为非一般主体存在之一：法津主体	89
第四章 作为非一般主体存在之二：道德主体	106
第五章 作为非一般主体存在之三：哲学主体	126
第六章 作为非一般主体存在之四：信仰主体	156
第七章 作为非一般主体存在之五：艺术主体	174

第四编 理性主体的危机及解救

第一章 主体的黄昏？	187
第二章 反思科学理性：艺术主体建构的外在条件之一	190
第三章 艺术主体建构的其他问题	201
后记	206

第一编 概论

第一章 西方主体三段论

迄今为止，人类全部的历史是主体的存在史。因此研究主体就是研究人自身。

主体是西方哲学的主流范畴，它承载着西方人的命运。然而作为一形上的范畴，其产生、发展、演化皆表现了深切的历史情结。透过历史的镜像，我们可以把握主体嬗变的脉络。当人从蒙昧的神话意识中挣扎出来时，自然成了人们亟待认识与征服的客体，然而在前苏格拉底阶段，人们只是默默地做着这种工作，缺乏对主体的理性自觉。中世纪的神学至上论将主体消隐在神的光环之中。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发现了自然，主体性日益彰显，但却伴随着主体的异化，于是后现代主义有人呼“人死了”（福柯）。这似乎印证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无——有一——无。

一、西方文化伦理学转向：主体的确立

西方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可以苏格拉底作分水岭。前苏格拉底哲学以自然哲学为主，其特征是对自然——特别是宇宙生成论——的关注。此期的人们思维具有神秘主义的蒙昧色彩，还保留了原始氏族似的对自然的畏惧与惊恐，因此亟待认识这个客体，以消除对一种异己力量的焦虑。这种迫切的任务，使人们还无暇顾及自我的存在，至少还没上升到自觉的层次。

对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的理解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此期的自然哲学体现了一种直观朦胧的思维特征，其对宇宙生成及自然结构问题的思考具有很大的猜测成分和神秘色彩。这种思维特征缺乏现代西方自然科学思维的强烈的主体意识。
2. 此期的自然哲学是原始思维的沿袭，是人对自然压迫的积极回应。
3.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相对于近代科技的超功利性，它表现了主客体合一的一元文化倾向，具有“人在自然中，自然在人中”的特征。

4. 这种直觉的一元的蒙昧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中国当时的文化即用一种蒙昧的直观的思维描述宇宙生成问题。如《易经》用阴阳二气的互动说明宇宙生成，《尚书》中也有五行生成论的记载。这与西方的“水”说、“火”说、“气”说、“元素”说等何其相似。

5. 西方早期的这种蒙昧的科学精神，后来成功地提升到自觉的理性层面，而中国的文化却没有。其根源也许在于西方有逻各斯（logos）的理性基因。有史可考的逻各斯思想是由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其对西方日后的文化及思维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中国早期则缺乏这种逻各斯基因。

到智者学派时期，随着古希腊的繁荣及民主的推进，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这对人们如何认识自我及社会提出了挑战，也为其实现的“伦理学转向”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

1. 由于古希腊的强大和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使其成功地完成了从农业文化向商业文化的转向。商业文化是一种本能地呼唤主体性的文化。因为市场的经济行动需要主体独立参与和选择，并为这种选择负责任，而且其公平的取向也内在地要求个体的主体性彰显。

2. 西方在迈进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成功地瓦解了氏族宗法血缘关系，使个体从温情脉脉的宗法群体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自由主体。这种对血缘的瓦解在古希腊史中随处可见。埃斯库罗斯在恐怖中说到一个“俄瑞斯特斯”的故事。希腊远征军统帅阿伽门农回来后被其妻子伙同奸夫谋害。其子俄瑞斯特斯为报父仇把其母和奸夫杀死。复仇女神认为其杀母犯大逆之罪，于是起诉他，但阿波罗却极力为俄瑞斯特斯辩护，认为俄瑞斯特斯的母亲虽然杀死的是其没有血缘关系的丈夫，但按正义的法治原则也该论罪，所以俄瑞斯特斯是替邦行义当无罪。结果审判长雅典娜宣布俄瑞斯特斯无罪。^[1]

3. 法治原则为主体的解放提供了保障。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思想盛行，法治本质上呼唤自由的主体，而人治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是靠身份来维续的。苏格拉底在法庭中曾跟一个起诉人聊过天。该人

[1] [德] 古斯塔夫·施瓦布：《古希腊古典神话》，曹乃云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536页。

起诉的是其父亲，因为他把他的仆人打死了。这种事情在中国就是大逆不道。中国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情大于法。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孔子认为亲亲相隐才是所谓的正直，这显然把血缘之情放在法规之上。而伦理血缘是消解主体的天然手段。

4. 民主内地需要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参与。在会议的辩论中，公域的演说中，投票表决中等都需要主体的自由选择，这就使人们的主体性越发凸显。智者的教授事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5. 由于政治、经济的繁荣，及其对具有主体性的公民的内在需求，加之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复杂，使人们对“人”越发关注。智者普罗泰戈拉声言：“人是万物的尺度。”^[2]这句话影射出雅典人自豪之情，也内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自然，特别是社会的问题需要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去解决，在此过程中彰显了人们的主体性。当然这也为主体性提出了要求：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这使“认识你自己”成为迫切的问题，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有二联，其一为“选择适度的行为”，其二为“认识你自己”。

6. 苏格拉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出场的。他总结了以往的哲学思想，将哲学的基本任务定格于“对德行的研究”^[3]。这就是著名的“知识即美德”的命题。德行当然是人的，故苏格拉底大力呼吁“认识你自己”，这就从理性的角度提升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及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将其上升到自觉的哲学思考的高度。正如黑格尔所言：“（苏格拉底）不仅宣布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且宣布作为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4]

7. 苏格拉底完成了西方哲学的伦理转向，被誉为西方“伦理学之父”，其突出的贡献在于将理性（逻各斯）和自由（努斯）的精神镶嵌在主体对自我的思考之中。这就开了西方形而上学主体论的先河。成为往后西方哲学绕

[1] 程昌明注释：《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2] 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页。

[3]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5页。

[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6页。

不过的一道坎：近代认识论的主体，现代存在论的主体，后现代欲解构的主体等都是在苏格拉底所开创的伦理主体的话语背景下展开的。

当然古希腊的伦理学转向并不是人们放弃了对物质世界的思考，而是说人们将对“自我”的思考置于前者之上，更加关注主体性问题，使理性与自由的意志更多应用于伦理及其与之相关的政治、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应当怎样生活才是幸福的”等基本问题之上的。这使西方深深打上了伦理主体的烙印，即使是超功利的科学思考都难说是纯粹地超功利，因为自由思考可以给主体带来精神的愉悦。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很崇敬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拜访他并问他有什么要求，第欧根尼把手一挥道：“莫挡我的阳光！”他宁要灵魂的安宁和自由的思考也不要荣华富贵，因为他认为这更幸福。^[1]

二、西方文化认识论的转向：主体的深化

认识论的转向发生于近代，与文艺复兴有很大的关系。文艺复兴有两大发现：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的发现实质是人们对古希腊的理性和自由的复兴，这种理性与自由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成了一个超越神意的独立自由的理性主体。自然的发现使其成为自由主体的客体。这为二元论的认识论哲学的创立提供了契机。

可以这样来认识这种认识论转向。

1. 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性。整个文艺复兴是在资产阶级蓬勃发展欲突破旧的生产关系、思维模式下进行的。理性和自由的复兴及自然的发现为新兴阶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认识世界以利用之成为一项迫切的时代课题。这种课题催生了主体性的积极彰显，以至于形成“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自然物被看作完全是可依据我们的目的加以使用的‘它’。”^[2]这就使“自然从养育万物的‘母亲’变成‘任人宰割’的‘材料’”。^[3]

2. 认识论的转向在伦理功利的前提下蕴含了深刻的科学理性精神。认识

[1] 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390页。

[2] [美] 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3] 贺来：“价值秩序的颠倒与现代社会的命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

首先是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认识，主体正是在这种认识中发现和肯定自身价值的，这就使科学理性的精神得到蓬勃发展。而哲学的任务自然就定格于科学理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一点不论是英国的经验论还是欧洲大陆的唯理论都得以充分体现。

近代认识论转向有以下几个人物值得关注。

1. 弗兰西斯·培根。培根后半生致力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出版了《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等相关著作。他说：“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1]他很强调知识（真理）的重要性，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因此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自然的规律。在何以可能认识自然规律方面，他认为首先要排除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假相和错误观念——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其次人们应排除感情意志和感官迟钝的阻碍；最后，应用实验和科学归纳法作为取缔形上逻辑的新工具，因为“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的花里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也正像这样。”^[2]弗·培根显然继承了中世纪末唯名论者的思想，趁着文艺复兴的历史潮流，将人的主体性定格在对客体的认识方面，这种思想比笛卡尔稍早。

2. 弗·培根是英国经验主义创始人，而笛卡尔则是欧陆唯理论的鼻祖。笛卡尔的毕生工作都致力于科学及其方法的思考。他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著作有《谈方法》、《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等。与培根不同的是笛卡尔更强调主体的思维（或意识、理性）在认识自我的作用。他说：“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3]他还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说：“严格地说来，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

[1] 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伟大的复兴（序）》，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9页。

[2] 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新工具》（第一部），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8页。

[3] [法] 笛卡尔：“谈谈方法”，载《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8页。